

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续集

蒋绍愚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续集/蒋绍愚著.—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ISBN 978-7-100-08497-0

I.①汉… II.①蒋… III.①汉语史—文集
IV.①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3757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HÀNYŪ CÍHUÌYŪFĀSHĪ LÙNWÉN XÙJÍ

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续集

蒋绍愚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8497-0

2012年 月第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2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目 录

关于汉语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1
打击义动词的词义分析·····	26
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	58
词汇、语法和认知的表达·····	106
从{走}到{跑}的历史更替·····	121
汉语“天”的意义的演变·····	151
汉语颜色词的历史演变·····	166
五味之名及其引申义·····	183
从助动词“解”、“会”、“识”的形成看语义的演变·····	202
词义演变三例·····	222
音义关系析论·····	249
读《广雅疏证》札记·····	262
说“引申假借”·····	277
《论语》的阅读与理解·····	300
“给”字句、“教”字句表被动的来源——兼谈语法化、类推和 功能扩展·····	323
受事主语句的发展与使役句到被动句的演变·····	346

魏晋南北朝的“述宾补”式述补结构·····	367
从“尽 V—V 尽”和“误 V / 错 V—错 V”看述补结构的 形成·····	405
汉语“广义处置式”的来源——兼论“词汇替换”·····	433
把字句功能的历史演变·····	455
近代汉语的几种被动式·····	495
汉魏六朝汉译佛典中“来”的四种虚化用法·····	511
《世说新语》、《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贤愚经》、 《百喻经》中的“已”、“竟”、“讫”、“毕”·····	
语言接触的一个案例——再谈“V(O)已”·····	527
也谈汉译佛典中的“NP ₁ , NP ₂ + 是也/是”·····	542
语言发展与语言接触·····	563
语言中的文化信息·····	582
东西南北·····	595
李白、杜甫诗中的“月”和“风”——计算机如何用于古典 诗词鉴赏·····	613
《唐诗三百首》·····	631
后记·····	655
	667

关于汉语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汉语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汉语史的研究如何深入?这个问题很大,在汉语语音史、语法史、词汇史等方面都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但本文不打算涉及这些具体问题,而是谈三个与汉语史研究有关的问题。

一 汉语史研究的分和合

汉语有漫长的发展历史。对汉语的研究,开始大致是两分的:“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而且,除了音韵学很早就分出“古音”和“今音”,在 20 世纪初就提出了“北音学”以外,“古代汉语”通常是作为一个平面来研究的,如“古汉语语法”实际上就是先秦语法,“古汉语词汇”实际上也是先秦词汇。1957 年王力先生《汉语史稿》出版,标志着汉语史研究的开始。汉语史是强调汉语的历史发展的,不再把“古代汉语”看作一个平面。王力先生把汉语史分为四个时期: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并且提出了各个时期的时间界线。顾名思义,“汉语史”是应该包括现代汉语的。但是,后来似乎形成了一种共同的看法:汉语史的研究只限于现代汉语之前(下面说到“汉语史”时,都按照这种通常的理

解)。这样就成为“汉语史”和“现代汉语”的两分。20世纪80年代吕叔湘先生提出了“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分的看法,认为“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从本质上说,从晚唐五代到清代这一时期的汉语和现代汉语并没有质的不同,至少,两者之间是有很密切的联系。但是,在实际研究工作中,要把现代汉语合并到“近代汉语”中去,看来是有困难的。不过,从那以后,“近代汉语”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到,“近代汉语”的研究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再往后,随着汉语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又认识到“近代汉语”不是由“古代汉语(上古汉语)”直接演变来的,中间还隔着一个“中古汉语”时期,这个时期非常重要,其语言特点既不同于“上古汉语”,又不同于“近代汉语”;“中古汉语”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这样,整个汉语的历史又分成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看起来,这似乎回到了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提法,但是,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反映了将近半个世纪研究的进展和深入。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讲到汉语史的分期时说:“因为我们对于汉语的历史,特别是对于汉语语法的历史,还没有充分研究过。现在只能提出一个初步意见。”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当时整个学术界对汉语史的研究还不深入,王力先生只能凭他自己渊博的学识来做一个大致的判断。而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人们对汉语史的研究比较深入了,对“近代汉语”、“中古汉语”的特点以及上下线问题都有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再提出“近代汉语”、“中古汉语”,就比20世纪50年代时的认识深入多了。自从再次提出“近代汉语”和“中古汉语”之后,这两个领域中的研究有了很大进展。1985年召

开了第一次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2000年召开了第一次中古汉语学术研讨会。此后两个研讨会都定期举行,推动了这两个领域的研究。

“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的分期是符合汉语实际的,做这样的区分对学术研究也有好处。汉语的历史实在太长了,研究者用毕生的精力也未必能通晓从上古到近代的汉语。把汉语的历史研究分成几段,研究者专攻其中一段,比较容易深入。各个时期汉语史的研究深入了,连贯起来,整个汉语史的研究也就深入了。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如果把“上古”、“中古”、“近代”、“现代”的研究割裂开来,互不通气,那就会不利于汉语史的研究。

(一)首先,汉语史的研究应当既有分又有合。

为了研究的需要,汉语史应当分期;但实际上汉语的历史发展是连续的。对有些语言现象的考察必须把几个不同时期联系起来。

如,处置式“把”字句是在唐代出现的,但是早在东汉的佛典中就有了表处置的“取”字句和“持”字句,东汉的某些“将”字句也可以看作是处置式的萌芽。这些都是必须和“把”字句联系起来研究的。同一种语法格式的历史发展不能因为不同时期而分割开,这是不言而喻的。

几种不同的语法格式也会相互联系,有时也需要把不同时期打通,做综合的研究。如汉语表被动的标志,上古有“为”、“见”、“被”等,中古“被”字句进一步发展,近代出现了“教”、“给”等。研究表被动的“教”字句、“给”字句的形成,当然是近代汉语范围的事。“教”字句和“给”字句本来都是表示使役的,为什么

能发展为表被动呢？使役句和被动句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使役句在动词前面的是施事，被动句在动词前面的是受事。用“教”字、“给”字构成的使役句要演变为被动句，一个必要的前提是在“教”字句、“给”字句的句首出现受事主语，如白居易诗“茶教纤手侍儿煎”这样的使役句才有可能发展为被动句。这就牵涉到受事主语句的历史发展。汉语的受事主语句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先秦到明清有很多变化。先秦两汉时还不可能出现像“茶教纤手侍儿煎”这种类型的带受事主语的使役句，所以当时的使役句“使”字句、“令”字句不可能变为被动句。只有到唐代，受事主语句的发展条件成熟，当时的“教”字句以及清代的“给”字句才能演变为被动句。所以，近代汉语中出现的“教”字句、“给”字句由使役到被动的演变，必须和受事主语句从上古到中古以至近代的发展联系起来研究，才能把它演变的条件和机制说清楚。（见蒋绍愚 2004a）

再如，在现代汉语中，“我吃完了”和“饭吃完了”都可以说，其主语一是施事，一是受事，而其谓语却一样，都是“述补+了”；也就是说，施受关系的表述采用的是同样的形式。这种现象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应该说是述补结构出现以后，我们见到的例子是在唐代。如“天子怒，当时打杀”（《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无公验者并当处打杀”（同上，卷四）。以“述补+了”为谓语的现于宋代，如“子夏此章皆是说到诚处，说得重了”（《朱子语类》卷二一），“此‘直’字说得重了”（同上，卷三六）。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也必须联系到上古和中古汉语。上古汉语中也可以有受事主语句，但其形式是和施事主语句不同的。如“韩献子将斩人”（《左传·成公四年》）是施事主语句，动词“斩”（及物）后面必

须有宾语。如果“斩”后面没有宾语，它前面的名词就成了受事主语，整个句子就成了所谓“反宾为主”的形式，如“龙逢斩，比干剖”（《庄子·胠箧》）。从什么时候起，上古的这种施受关系的不同形式变成后来的施受关系用同一种形式？是什么因素促使这种变化？这都需要把上古、中古、近代联系起来研究。特别是近代的无标记被动句（“无公验者并当处打杀”）的兴起，肯定是与上古无标记被动句（“龙逢斩，比干剖”）的衰亡有关的，这两者应该放在一起研究。

研究词汇的历史演变也需要把几个时期打通。有的词的演变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完成的。如“走”从先秦的“跑”的意义演变为“行走”的意义，经过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在中古时可以看到有一些“走”的“速度快”的意义逐渐减弱，到唐代有少数例子“走”已有“行走”的意义。但在明代的语料中，“走”还兼有“跑”和“行走”的意义，而且比例大致相当。直到《红楼梦》中，“走”的意义才和现代汉语一样。这类词义演变的研究，是无法用分段的办法来做的。（见蒋绍愚 2005）

到目前为止，汉语史的研究主要是专题和专书的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今后必须继续做好。但与此同时，也还应注意一些更宏观的问题，考虑一下几千年来汉语在总体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比如，汉语表达的精密化，从综合到分析的发展，从无界到有界的发展，汉语语法化的规律，汉语词汇演变的规律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当然，这些问题相当大，我们不能凭“想当然”来回答，也不能仅凭一两个例子就做出普遍性的概括。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经过全面深入的研究，包括对相关问题研究成果的综合和深化。如果要研

究这些问题,就更需要把各个历史时期联系起来,有时还要把语法和词汇联系起来。即使做的不是这样的宏观研究,而是研究具体的专题或专书,最好也要把具体问题放到汉语发展的大背景上来考察,这样可能眼界更开阔,研究更深化。从这方面讲,汉语史研究也应该既有分又有合。

(二)其次,汉语史的研究应当和现代汉语的研究结合起来。

如果把汉语的研究分成现状的研究(现代汉语的研究)和历史的研究(汉语史的研究)两大块,那么,无可否认,现状的研究更为重要。这是关系到十三亿中国人民学习和使用汉语的大问题(中国的少数民族也要学习汉语),是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的大问题。当然,研究汉语历史的重要性也是不容低估的:一方面,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必须研究汉语的历史,另一方面,汉语的现状是汉语历史发展的结果,要清楚地了解汉语的现状,也离不开汉语历史的研究。这些道理,研究汉语史的人都懂得,但是,怎样使汉语史的研究能加深对现代汉语的了解,这种意识却不是很强。似乎现代汉语的研究和应用完全是搞现代汉语的人的事,我们搞汉语史的就顾研究历史;至于汉语史研究的成果和现代汉语有什么关系,那也是搞现代汉语的学者的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这样,汉语史的研究就完全局限于历史的领域,而失去了对现代汉语研究和应用的参与意识。其实,在这方面,汉语史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事实上,现代汉语的一些语法、词汇问题,要从历史上考察才能说得更清楚。

举两个例子。

1.研究现代汉语的学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只能说“他是小王的老师”,不能说“他是小王的教师”?这个问题是

从配价语法的角度来回答的：“老师”是二价名词，所以可以有二个论元“他”和“小王”。“教师”是一价名词，所以只能有一个论元“他”。（见陆俭明 2003）这当然是正确的回答。但是，如果进一步问：“老师”和“教师”指的是同一种人，为什么一个是二价，一个是一价？这个问题，无法从现代汉语的平面上回答，而必须从汉语史的研究找答案。从汉语史的角度看，“老师”和“教师”虽然都有一个语素“师”，但是这两个“师”实际上是不同的。“老师”古代就称“师”，是传道授业的人，所以总是和被传授的人分不开的。《荀子·修身》：“师者，所以正礼也。”《礼记·文王世子》：“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老师”最早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这个“老”是“年老”的意思。现代汉语中“老”是词头，但“师”仍是这个“师”，所以“老师”是二价名词。“教师”的“师”是表示一类有某种技能的人，如古代有“渔师”、“罟师”，现代有“厨师”。左思《吴都赋》“篙工楫师”吕向注：“工，谓所善；师，谓所长。皆使其驾行舟者。”“教师”在元曲中可以见到：张国宾《罗李郎》3：“人都道你是教师，人都道你是浪子。”意思是教习歌舞技艺的人，到清代才指传授知识的人。因为和“罟师”、“厨师”一样是一种职业，所以是一价名词。从这个例子不但可以看到汉语史和现代汉语的联系，而且可以看到词汇和语法的联系。

2.有些现代汉语的复合词，被认为其构词方式是无法分析的。如“卧病”，意思是“因病而卧床”，但“卧”在前，“病”在后，和汉语的语序相反，是一种无法解释的构词方式。确实，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看，“卧病”一词中两个语素的这种顺序在构成句子的词序中是找不到的。但是，“今天的词法曾是昨天的句法”（T.

Givon)。这种词序在汉语史中是否能找到呢？我们找到了这样的句子：“诘朝尔射死艺”（《左传·成公十六年》），“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韩愈《进学解》）。“死艺”、“号寒”、“啼饥”都是“因～而V”，但语序都是“～+V”。在古汉语中，“卧病”或“卧疾”也是这种词序的一个词组：谢灵运《命学士讲书》：“卧病同淮阳，宰邑旷武城。”谢灵运《斋中读书》：“卧疾丰暇豫，翰墨时间作。”白居易《琵琶行》：“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古汉语的这种词序在现代汉语中消失了，但“卧病”凝固成一个词在现代汉语中保存下来。如果只看现代汉语的平面，“卧病”的构词方式确实是不好解释的；但如果把汉语史联系起来考察，就不但能解释这种构词的由来，而且可以看到句法和词法之间的历史上的联系。

还有些问题，如果把汉语史和现代汉语结合起来，就会认识得更全面。这里也举一个例子。

比如汉语中的“把”字句，它的性质和功能该怎么认识？王力先生称之为“处置式”，顾名思义，是对于对象的处置。有的学者认为，“处置”不能概括“把”字句的用法，比如：“这班学生把王老师教惨啦”，不能说是“学生”对“王老师”的处置；因此，“把”字句的作用应该这样表述：如果将“把”字句写作“A把BC了”，那么，这个句子表示的是“由于A的关系，B变成了C所描述的状况”。（见薛凤生1993）换句话说，这是把“把”字句的功能看作是“致使”。确实，这种解释适合于现代汉语中很多“把”字句。但是，如果看一看近代汉语中的“把”字句，就会看到，有很多“把”字句不能这样解释。“把”字句产生的初期，很多句子是单个动词做谓语，而“把”后面的名词是这个动词的受事。比如：宋

之问《温泉庄卧病》：“徒把凉泉掬。”《祖堂集》卷一六：“仰山便把茶树摇。”都不能解释为“致使”。其实，在现代汉语中也有不少“把”字句不能解释为致使。如：“小张把小王看了一眼。”“王老师把这班学生教惨啦！”那么，应该怎样来看待“把”字句呢？应该说，“把”字句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把”字句产生的初期，主要是表示处置；后来，逐渐演变为表示致使，但还有一些仍然表示处置。至于这个由表处置到表致使的变化是在什么历史时期逐渐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些问题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

这不过是随手举出的几个例子，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一些。但重要的不是再找若干零星的例子，而是要从整体上把汉语史和现代汉语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弄清楚现代汉语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如果能这样做，一定能有巨大的收获：一方面可以对现代汉语了解得更深入，另一方面可以对语言演变的规律有更多的发现。这项工作以前是做得不够的。近代汉语本来是和现代汉语关系最密切的，但是，以往的近代汉语在溯源方面做得比较多，而对近代汉语如何向现代汉语发展的研究则十分薄弱。这在今后是需要努力加强的。

汉语史研究和现代汉语研究的结合还有另一个方面：应该说，现代汉语的研究方法走在汉语史研究的前面。当然，汉语史研究的对象和现代汉语研究的对象并不相同：后者研究的是活的口语，前者研究的是死的历史文献（汉语史的研究也可以用现代汉语方言做参考，这在下面就会说到；但汉语史研究的基本资料还是历史文献）。所以，汉语史研究不能盲目搬用现代汉语的研究方法。但是，现代汉语的一些研究方法，至少是汉语史研究

应该借鉴的。

二 汉语史研究与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结合

汉语史研究与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结合有极大的好处。汉语史研究依据的是死的历史资料，现代汉语方言是活的语言数据。汉语历史演变中出现的一些语言现象，往往在现代汉语方言中依然保留，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可以相互补充。同时，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一些语言现象，是在历史文献中和普通话中看不到的，这对汉语史的研究也有启发。

就语法而言，以方言的语法和汉语的历史语法相比，有三种情况：

(一)方言中一些方言的语法形式在汉语语法史上出现过，这对于研究汉语语法史当然很有帮助。

1.在上古汉语中，表示一种新情况的出现，在句尾用“矣”，如《左传·成公二年》：“余病矣。”从唐代开始也可以用“也”，如《旧唐书·安禄山传》：“阿与，我死也。”从宋代开始用“了”，如《朱子语类》卷七：“不知不觉自好了。”“矣”和“也”在现代汉语方言都有保留。台湾闽南话的[a[˥]](矣)，如：“伊去[a[˥]]”显然是上古汉语中的“矣”的保留形式。陕西清涧话用[.lɛ](了也)，也可以用[ɛ](也)，如“大了他自然儿解开(明白)[ɛ]”，是唐代语法形式的保留。

2.汉语史上的处置式，南北朝时用“将”，唐代才用“把”，而且早期的处置式，有的动词后面的宾语仍然保留。如陆勋《志怪》：“船者乃将此蟾以油熬之。”粤语的处置式用得不多，用处置

式时多用“将”字，少用“把”字，而且动词后往往有一个代词宾语“佢”复指“把”的宾语，如：“我想将呢棵樹斬咗佢。”这和汉语史的早期形式非常一致。汉语式上的处置式，句中的动词最初是单音节的，如宋之问《温泉庄卧病寄杨炯》：“徒把凉泉掬。”后来才逐渐发展为双音节的。台湾闽南话的处置式谓语动词可以是单音节的，如：“阿公把阿英骂。”这也和汉语史上处置式的早期形式一致。有的学者认为，现在见到的唐代早期的处置式多出现在诗句中，动词都是单音节，这是受诗律限制的结果，未必是当时实际语言的形式。但是，现代台湾闽南话中的情况可以说明，唐代口语中处置式以单音节动词为谓语不是不可能的。

3.在汉语史上，述补结构带宾语时，补语和宾语有两种位置：一是宾语在述语和补语之间，一是补语在述语和宾语之间。如动结式的VOC和VCO：“打头破”和“打破头”（均见于《百喻经》）。能性补语的肯定式“V得OC”和“V得CO”：晏殊《踏莎行》：“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朱子语类》卷五九：“亦只是大纲如此说，不是实考得见古制。”能性补语的否定式“VO不C”和“V不CO”：《北梦琐言》：“聚六州四十三县铁打一个错不成也。”《祖堂集》卷二：“分付不着人，所以向你道。”复合的趋向补语，宾语也有两种位置：一是宾语在复合的趋向补语之前，一是宾语在复合的趋向补语中间，即“VOCC”和“VCOC”：《朱子语类》卷一：“有人见海边作旋涡吸水下去者。”《朱子语类》卷一二〇：“忽然部中又行下一文字来。”汉语史上出现过的这两种词序，前一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不存在了，但在其他方言中还保留。如吴语的VOC“打其杀”，V得OC“打得佢过”，VO不C“打伊勿过”；客家话的V得OC“食得饭落”；粤语的VOCC

“拎咗条手巾子出嚟”。这些都是汉语史上曾经有过而在现代普通话中已经消失了的形式。

4.唐代的差比句中,在用表示比较的“比”或“于”的同时,还常常用“校”字,在白居易的诗中,这些形式很常见。如:《江楼夕望招客》:“能就江楼销暑否?比君茅舍校清凉。”《以诗代书酬慕巢尚书见寄》:“不知待得心期否?老校于君六七年。”这种用法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也消失了,但在有的方言中还存在。如台湾闽南话的比较级在用“过”、用“并”的同时,还用“较”字,如“阿明较悬(高)过阿平”、“阿明并(比)阿平较悬”。

这些语法形式如果和汉语语法史结合起来研究,肯定能够相得益彰。

(二)方言中一些语法形式和汉语语法史上出现过的形式不一致,但有关系。

1.表示体貌的助词。汉语语法史上表完成的动态助词和表持续的动态助词是两个不同的词,前者是“了”,后者是“着”,尽管有一个时期“着”既可以表持续也可以表完成,但两者的分工基本上是明确的。而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情况并不一样。在粤语和客家话中,表完成的动态助词和表持续的动态助词也是不同的词,粤语是“咗”和“住”、“紧”,客家话是[t'et²²]和[ten³¹](等)。而在吴语中,表完成的动态助词是“仔”,表持续的动态助词是“勒海”,但“仔”也可兼表完成持续。在台湾闽南话中,用[le⁰]表动作的持续完成。这里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1)这些动态助词的历史渊源是什么?“咗”大概来源于“着(著)”,“仔”有的学者也认为是来源于“着(著)”,但它们都不是表持续,而是表完成,这是怎样一种历史发展?“勒海”的来源大概是表

存在的同形动词。而其他动态助词的来源待考。(2)为什么“仔”可以兼表完成持续?为什么 $[le^0]$ 可以兼表持续完成?在汉语语法体系中,“完成”和“持续”这两种体貌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有的方言中两者用不同的助词,而在有的方言中两者用同一个助词?

2. 动词重迭,表示短时貌。在汉语史上,最初动词重迭是表示动作反复进行的,如《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表示短时貌的动词重迭是很晚产生的,而且是先有“V—V”(第二个V是同形动词做动量词),然后才发展为“VV”。如《朱子语类》:“试定精神看一看。”《元曲选·竹坞听琴》:“也到员外家看看去。”但客家话中没有“V—V”,而是说“VV na⁵⁵ le²²”,如“看看 na⁵⁵ le²²”,而且后面不能带宾语,不能说“看看 na⁵⁵ le²²书”,只能说“书看看 na⁵⁵ le²²”。那么,客家话的动词重迭是不是没有经过“V—V”的途径?它是怎样发展来的?又:广州话中“VV”和“V—V”用得很少,动词重迭的主要形式是“V下”,这是从“V一下”发展来的。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途径?为什么广州话中“VV”和“V—V”都用得很少,而“V一下”——“V下”却发展成短时貌的主要形式?

3. “把”字句和“被”字句。从语用的角度看,“把”字句和“被”字句都具有一种功能:把动词的宾语提前。“把”字句是把动词的宾语提前为“把”的宾语,“被”字句是把动词的宾语提前为句子的主语。在汉语史上,当句子的谓语发展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往往用“把”字句或“被”字句把动词的宾语提前。如《红楼梦》九回:“把宝玉的一碗茶也砸得碗碎茶流。”这句话也可以说成“宝玉的一碗茶也被砸得碗碎茶流”,但说成“砸得宝玉的一